

THE REVOLUTION

OF 1525

THE GERMAN PEASANTS' WAR FROM
A NEW PERSPECTIVE

1525 年革命

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

[德] 彼得·布瑞克 著

陈海珠 钱金飞 杨晋 朱孝远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REVOLUTION

Of 1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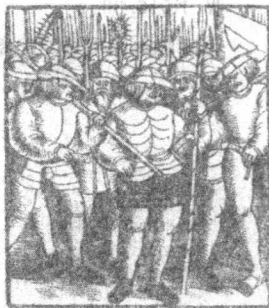
THE GERMAN PEASANTS' WAR FROM
A NEW PERSPECTIVE

1525 年革命

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

[德] 彼得·布瑞克 著

陈海珠 钱金飞 杨晋 朱孝远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original edition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Peter Blicke, Die Revolution von 1525
© 1975, 4th ed. © 2004 by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GmbH, München
Chinese edition © 2008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版权登记号:20-2007-1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525 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德)布瑞克
著;陈海珠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
ISBN 978-7-5633-7112-9

I. 1… II. ①布…②陈… III. 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6)—研究
IV. K51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030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 271000)
开本:965mm×690mm 1/16
印张:18.75 字数:230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布瑞克教授和他的农民学研究学派(代译序)

朱孝远

谁试图把布瑞克(Peter Blicke)教授的名字同那些只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农民运动起源的学说区分开来,并且试图把农民的形象永久地雕刻在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那么,谁就算是真正理解布瑞克农民学研究学派的伟大意义了;谁试图回忆布瑞克教授为农民运动所做出的千百次的、天使般的辩护,谁就会首先想到布瑞克慷慨激昂言辞下的农民团体、农民的道德使命,以及千千万万的农民是如何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

布瑞克教授是我们当今世界把农民作用提高到最高程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一位德国教授,却服务于瑞士的伯尔尼大学。更重要的是,他是服务于一个崇高的使命:正确阐述农民对于缔造现代社会的作用。为此,他几乎穷尽地研究了有关十五六世纪德国农民的所有原始文献,包括各式各样的农民的怨情陈述书、各式各样的农民运动的纲领、各式各样的农民乡村组织的史料。布瑞克教授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一天接着一天,一年接着一年。在他那硕大无比的伯尔尼大学的工作室里,布瑞克这位德国历史学家开展研究,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正式出版了。一个布瑞克农民学研究学派脱颖而出,一个让世界震

惊的结论向世界宣告：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英雄，并不是什么舞刀弄剑的帝王将相，而是百姓，一个以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组成的普通人阶层，他们在特定的时刻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在他们面前纷纷分崩离析，一部由公社、议会和共和国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乐在欧洲大陆奏响。欧洲的农民，普通的百姓，只要起来奋斗，始终是有能力、有条件地去建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创造出建立现代国家这样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重新评价农民运动

无法否认，布瑞克教授对我个人学术发展的影响无与伦比。早在 1987 年，当我准备以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起，布瑞克这个名字就开始与我相伴。因此，我必须先简明扼要地说说是什么情况使这位伟大教授的研究在我眼中变得可敬的。

1524—1526 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遍燃着战争烽火。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等联合起来，他们高举神圣的《福音书》，英勇抗击贵族领主的残暴压迫。当城堡、宫殿、修道院和诸侯住宅被付之一炬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僧俗贵族在农民面前被迫逃亡，帝国统治势力不得不为生死存亡而斗争。不久，当农民们被诸侯的雇佣军打败、屠杀和审判时，农民的一方显得单薄无助。当乡村中的农场、农民的房屋被火焰吞没时，那些关于基督教世界的美好向往，那些对兄弟之爱、友善、平等、正义和公正的追求，那些以《福音书》和基督教神法为指南、要求建立基督教人间天国的政治构思，似乎也与起义者崇高的斗争理想一起烟消云散了。但是历史却永远铭记了这场人民的革命运动。事件发生不久，一个同时代的人就称它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普通人的伟大起义”；革命导师恩格斯称它为“德意志人民最壮观的革命之举”；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施泰因梅茨断言它是“1918 年 11 月革命以前

德国人民最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而德国学者布瑞克则称它为“普通人的大革命”。

1525年的伟大运动虽然一直活在世界人民心中,这个运动却没有很好地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起义者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起义者们有很好的纪律,他们佩带宝剑,身着盔甲,扛着军旗,敲着军鼓,是一支支颇有军纪的队伍。这些队伍没有随意抢劫的习惯,而起义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劫富济贫。他们的领袖中不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这些纪律和军事风范告诉人们起义者不是捣乱的强盗,他们是为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真正的友爱、和平、忍耐、和谐而作战的真正的军人和基督教徒。他们要反对的是福音的死敌,要制止的是不敬神者的反基督行为。他们所具有的使命感、道德感和正义性,使他们完全不同于绿林兄弟。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兄弟,肩负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使命。

第二种通常的误解是把起义看成一种单纯反对剥削的经济斗争,如认为起义者都是清一色绝对贫困的农民或农奴,这些人没有政治头脑,只是在遭受压迫情况下为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才揭竿而起的;他们没有推翻领主、诸侯封建统治的愿望,整个起义都是一种经济斗争。

这些有关起义的误解不仅仅存在于群众的观念之中,就是在专业的学术圈子里,也充满了对起义的奇谈怪论。早在起义结束后不久,就有两个同时代的作家断言是马丁·路德反对教会的福音运动诱发农民起来反对他们的合法领主;农民们的起义仅仅是为了一些经济上的改善;这些农民非常残暴,他们滥杀无辜;除此之外毫无结果。这些观点直到20世纪还有人在不断地重复着。不过,21世纪的大多数的学者对此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参加1525年运动的那些农民是老百姓中有责任心的人们,而绝不是罪犯;起义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起义者们没有滥用暴力;革命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后果。起义是下层人民的一次政治行动,而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斗争。起义显示了人民大众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变化的看法和改变历史进程的企图。在宗教方面,有的学者对农民起义是路德改革运动精神的产儿的说法提出异议,指出农民信仰的不是路德教,而是他们自己的基督教。

正是在这样的一幅扑朔迷离的图像中,我接触到了布瑞克教授的名著《1525 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1975 年布瑞克提出了“普通人大革命”的新解释。布瑞克认为 1525 年革命的原因主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农业秩序危机。封建贵族为补偿他们在 14 世纪农业危机时受到的损失,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农民起义。他指出:“农民为参加政权而发动起义,希望用革命手段来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为此目的,他们成为现代国家积极建造者。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建设共分三个阶段——公社阶段、议会阶段和共和阶段。这种发展路线同自上而下的王权专制主宰的发展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布瑞克把农民革命的政治目标解释成了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的斗争、议会斗争和建立共和政治。布瑞克的解释是一种大的综合: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同德国历史学家弗朗茨和布塞罗两人所建立的“政治运动说”的解释相结合,建立了对德国农民战争比较复杂的解释。布瑞克的解释比较全面,他既关注农业危机的影响,如关注农民和贵族为争夺产品分配额的斗争,又把这场革命引申为一场由百姓来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斗争。布瑞克这样论述 1525 年革命的目标:“革命的社会目标是建立‘基督教共同体’、实现‘兄弟之爱’。从消极意义来看,这意味着限制特权等级的特权和权力。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在小政权林立的地方)谋求建立合作制的联邦制度;在大的领地政府管理的地方,谋求建立一种国会体制。由于改革力量的不足,革命最终失败,但却使农业经济得到解放(各地情况十分不同);法律上有了安全保证;农民的政治权利走向制度化和稳定化。”

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胸怀!因为布瑞克的使命就是本着博爱的精神将关于德国农民运动的分析牢固地建立在农民的真正需求和农村制度改革的层面上,进而阐明了这种改革对构建现代欧洲民主政治的作用。尽管布瑞克用的词句是“普通人的大革命”,实际上他是解答了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是第一次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命题。把路德宗教改革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很可以理解,但如何理解德国农民战争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呢?布瑞克的解释就是:农民的运动和城市的运动是具有联系和同步进行的;农村的公社和城市的公社异质同构,成为当时人

民的一种政治性的组织,在此基础上通过公社、议会和共和国,自下而上地发展出了现代民主政治。布瑞克以令人信服的智慧 and 汗牛充栋的原始文献,为欧洲最重要的农民运动——1525 年德国农民战争进行了重新评价,不仅赋予其政治的性质,而且发掘出了它推动欧洲现代化、特别是推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深层内涵。

不存在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布瑞克学派的要点,那就是:“不存在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现代化运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对此,就需要深入了解在社会人口总额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农民的要求。布瑞克认为,现代化的源头要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中去寻找。换言之,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不可能脱离农民的需要来谈论现代化的问题。

一、农民的需要是什么?

布瑞克首先强调的是,农民的需要是同 16 世纪德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背景相关的。在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农民也不再仅仅是“做工的”,而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觉悟的新阶层,农民要求改革农村的农业秩序。农业秩序一词,首先是从制度层面来说的,它的存在不以单个农民是否改善了其经济地位(如减少租税额度、废除农奴身份),而是要建立起一种新的机制,用来缓和德国社会变化带给农民的压力。近代早期国家的出现、大诸侯加紧收缩领地、地方上的小领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以及通过货币地租和领主自己对不动产剥削的发展,这些都最大限度地剥削了农民农业劳动的剩余。领主扩大自己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特权,加重赋税(dues)和劳役,并削弱农民的财产权。这种举措的一种方法就是农奴制(serfdom)。在这种制度的帮助下,农民遭受的剥削自 15 世纪以来就不断加剧。农民的经济状况非常可怜,到 1525 年更糟。正是这样的背景,农民开始行

动起来。布瑞克不同意把农民的行为完全看成是一种对于社会变化的被动应付,而是强调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经济的主动性,强调农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然而,这种农业秩序的改革仅仅是农民要为自己在经济分配上争得一个更为有利的份额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布瑞克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农业秩序的危机是旧封建体制瓦解时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如再版农奴制)和近代早期体制出现时完全忽略农民利益这两个原因引起的,因而1525年的德国农民运动就具有特殊的背景,有别于历史上那些仅为解决温饱问题而爆发的农民起义。事实上,布瑞克在这里想要揭示的是:离开农民需要来建立现代农村秩序,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德国的状况是:一方面,旧有的封建体制正在崩溃,新的经济体制正在兴起(如市场经济、土地、森林水泽等的财产所有权的确立、帝国和诸侯领地小邦赋税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另一方面,这种体制转变却给予农民更多的贫困和更多的不自由(如不再能使用公地和在森林里捕鱼打猎;缴纳更多的赋税)。在封建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时出现了诸多问题:领主土地所有权的强化,使农民(乡村自主的公社)无法再自行经营农业生产;公用的森林和公地现在成为有价之物,农民们无法再无偿使用公地,或在森林水泽中自由地打猎和捕鱼;尽管农民的身份已经是佃农,但劳役(services)和强制性劳动依然存在;随着近代早期国家的出现,不仅领地税和军事税不断增加,佃农现在还要以国家属民的身份向帝国缴税。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农村经济秩序转型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是在大幅度地下降,这就使得农村成为各种危机粘合起来的火山口,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民不得不组织起来,发动了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即1525年革命。

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农民与现代化”这个概念了。

二、那么,农民改革的性质又是怎样的?

它与社会的转型之间的区别和关系又是怎样的?

根据布瑞克的看法,经济问题还不是农民运动的起因,它只是农民运动产生的前提和诱发者。只有现代化和农村经济改革充分考虑农民的需

要、采纳农民的意见时,转型和改革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农村经济秩序改革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在农民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时,它才有可能真正地被完成。布瑞克有一句常常被人引述的名言:“我们将农民最主要目标视为重组领地政体,如果我们的判断不错的话,那这只是再一次证实我们的发现,即早些时候在领地国家这一层次上获得政治经验的农民,最易清楚地表述政治概念。”因此,农村经济秩序改革在性质上显然正是按照农民的要求来建立新的农村社会。布瑞克指出:

在政治结构的具体问题之外,普通人的要求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要素:在“公共利益”的口号下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在“基督教和兄弟之爱”的口号下破除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和社会的藩篱;在确保没有人为添加物的纯粹福音(通过民众选举教职人员来保障)的原则下谋求社区自治;以及以“神法”为依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联合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1525年的空想家试图将这些要素纳入理论上可接受的、有内在连贯性的体系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布瑞克怎样总结出这些目标的两个特征。首先,布瑞克是把农民运动放在现代化的框架里来探讨的,因此就凸显了农民在建立新体制方面的作用。其次,农村社会的内容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教育、社会平等各个方面。换一个说法,如果说农民运动的作用是要在建立新的社会体制时发出农民自己的声音的话,那么,根据农民的要求来重新考虑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就是一个伟大农民革命的最根本的目标。

农民革命与现代化这两者处于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没有一个农民参与的新型农村社会制度,现代化就无从产生,也就不能被理解;而没有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农民运动也就会始终停留在为自己争取一点经济利益的传统框架里,而无法反映出其现代特征。布瑞克因此把以古法(为自己争取权利习惯法)为依据的运动与以神法(即不加修饰的“上帝之言”,被用来争取社会平等)为理论的运动区分开来:前者是封建社会里农民保

卫自己权益的运动,后者是在“基督教兄弟之爱”的原则下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大联合,直至建立反映人民要求的人民民主社会,即建立“人间天国”。

三、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实现自己这些目标的呢?

布瑞克认为实现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布瑞克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农民运动“领地城市、帝国城市的平民和矿工都卷入了,那么普通人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泛呢?称这场战争为普通人的革命是否真的更恰当呢”?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全国的范围来考虑普通人的需要,因为农民和市民是联合在一起的,况且农村的公社组织和城市的公社组织也具有类似性。农民运动和市民运动因此可以放在一起考察(普通人的大联合),正是普通人的行动,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尤其是通过公社、议会和共和国三个阶梯,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近代民主政治。

在布瑞克那里,现代化的人民性质(或称民主性质)就这样被规定了:在他的著作问世前,少数领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用改进社会体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也被当做一种了不起的进步来渲染;与此完全不同,布瑞克的农民学研究学派在伯尔尼出现,告诉人们: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只能是那种由人民直接参与和推动的、根据人民需要来完成的现代化。即使16世纪的德国民众尚未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但是,他们无疑是缔造现代社会的先驱,他们的伟大之处,应当为世人所发现。

良师、益友和思想家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要说“如果你想了解德国的农民,到德国的南部和中部的绿色牧野和森林里去。如果你想了解德国农民运动的意义,那你要到瑞士的伯尔尼大学去”这句话。如果你是在南部德国,如果你是在莱茵—法耳茨州旅行,那么,看看昔日选帝侯的宫邸和素有葡萄酒之路之称的极为美丽的莱茵河谷,你就会知道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有多么质朴纯真了。士瓦本人、法兰克尼亚人和其他地区的德国人一样,都是德国理

性精神孕育出来的英华。南部德国其实离瑞士的首都伯尔尼不远,你乘高速国际列车,越过德国和瑞士的边境线,就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再从苏黎世出发,不过几个小时,你就到了瑞士的伯尔尼。由于瑞士在独立之前历史上曾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况且苏黎世、伯尔尼说的都是德语,所以德国人在瑞士工作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在1998年我在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蒂宾根大学访学时,我就是乘着这样的国际火车去伯尔尼寻找布瑞克教授的。我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来听听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我的博士生导师托马斯·布雷迪[Thomas A. Brady, Jr.]教授是布瑞克《1525年革命》一书的英译者)的教诲,二是要征求一下布瑞克教授的意见,是否同意我把他的那本名著《1525年革命》翻译成中文,以便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了解他的农民学研究学派的意义。

布瑞克教授是那种热情、友好、机智、幽默并且极富感染力的人:“你要研究农民,你就首先需要知道农民要的是什么。”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我们的谈话就这样无拘无束地展开了。知道我是他的好友布雷迪教授的学生,又是从北京大学来的一名教师时,布瑞克显得格外高兴。我于是告诉他我对他著作的批评意见:他的《1525年革命》写得过于理性、系统化了,似乎完美到无懈可击的地步,这恰恰是有点可疑,因为16世纪的德国农民,是无法具有这样的理性头脑的。我接着问:“自1975年《1525年革命》出版,至今已经二十几年过去了,你是否认为你书中的有些观点需要部分修正?”“不,”布瑞克说,“我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因为随着我现在研究的深入,我愈发感到自己探索的方向并没有错。”在这里,布瑞克表明了自己的旨趣:人必须不断向前走去,不断去发现去解决新的问题,而不必作茧自缚似的把精力放在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上。在布瑞克看来,一本著作不过是作者留下的一个脚印,只要前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那就不必强求每个脚印都标准化,因为那恰恰是极其危险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它有时会像丁香的花瓣般透出阵阵芳香,但若无率真的态度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它也就会枯萎,因为它难以满足人们那种要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来理解真相的迫切要求。

我记起那天的整个下午,我都参加了布瑞克教授的研究生讨论课。布

瑞克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德国人、瑞士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布瑞克正在世界范围内探讨公社推动现代民主的意义。布瑞克的上课是启发性和研究性的,这里常常是笑声不断——一个重要的学派,一个致力于研究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复杂关系的研究团体,就这样在伯尔尼大学讨论课的教室里产生。但是,不同的是,布瑞克特别注重民间文化和民众的需要。可以说,正是从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上,布瑞克学派独辟蹊径,把农民的作用提高到奠基欧洲现代化的高度,比单纯地论述农民怎样与封建主浴血奋战,来得更加妥善,也更加深刻。

那晚,难忘的是我在教授家里同他的彻夜畅谈。那天,教授是特别地高兴,居然把我带到了他的家里,开始讨论起瑞士、美国、德国和中国历史研究不同的风格来了。我们是越谈越高兴,布瑞克下面对我说的这段话,比较清晰地概括了他想对我们中国学者说的话:

我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模仿我们西方作者的风格。你是从中国来到美国,又从美国来到德国,今天你又来瑞士看我,并向我请教治学之道。而我所要说的,就是你一定要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世界、看欧洲、看西方文明。要记住,如果你单纯地模仿我们,要写出像我们这样的文章,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著作,你这一辈子注定是没有出息的——因为你并不如我们熟悉我们西方的传统,你也写不过我们的那些博士,他们从小在西方长大,又完全熟悉我们大学的培养体制(说句实话,实际上这样的博士生在我们这里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相反,你一定要去做开拓性的事情,你要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西方文明的缺点,来看我们学术研究上的缺点。那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我们西方人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你愿意那么干,我希望马上同你合作;相反,如果你只拘泥于向我们学习,单纯地模仿我们,那么,我一定不同你合作……你此行的目的,是要把我的作品向伟大的中国人民开放。但是,那不过是一种介绍,介绍我们西方人目前所做的一些粗浅的研究心得。但是,你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你要去为你

自己祖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要帮助中国实现学术上、文化上的现代化;你也要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这就不仅仅是去翻译几本书,而是要习惯于向我们挑战,你来挑我们的毛病,指出我们研究上的不足。那样的话,你就帮助了我们,也帮助了我们的西方人。因为,你所从事的,是一种我们西方学者无法完成的事情,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事情,是帮助和拯救我们西方文明的事情。

我相信,同我如此直白对话的布瑞克,实际上是一位思想家。当他在书房中沉思农民的需要的时候,当他站在世界学术之巅思考人类命运的时候,或者当他满怀敬爱的惊奇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的时候,他就有一首生命的诗在灵魂的深处震颤。他的农民学研究,他对我的谆谆教诲,都显示出了他那种特有的喜欢与强有力的命运进行挑战的骑士风度。这,正是人的精神的最可贵之处。在伯尔尼逗留的几天里,我尚未完全理解享誉世界的布瑞克农民学派的精粹,但我却还是领悟了一些道理:经济、金融业的进步是完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文化整体进步的;现代化是无法也从不脱离农民的基本需求的;经济改革是同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改革息息相关、同步发展的;欧洲的现代民主政治是由百姓们自下而上推动的;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是人民民主的现代化……这样,我就在伯尔尼那里看到了绿色:那片春天里的草地,天空,树林,田野。我是说,我们有时竟能如此轻易地去接近一个伟大学派内在的秘密。换言之,与其说我在这里是要陈列布瑞克教授的一切头衔、荣誉称号、求学经历和学术贡献,毋宁说我是要在给大家介绍一幅“普通人”布瑞克的素描。记住,这是一位用毕生精力为农民的现代化争取发言权的人。让我们翻开他亲手写下的每一本书,仔细阅读他的每一行字,以便亲眼看看曾经站在世界学术之巅的一代思想家,是如何把经济和政治、农民和现代化、财政与社会进步有机结合,产生出一个重要学术体系的。我能把布瑞克包括在当代少数的最杰出的学者之列,不是他创作了世界上公认的经典学术著作,而是他通过逻辑上的努力,通过对农民的挚爱,即通过一种完整的有意识的学术劳动,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放上了一块指示牌。当我们在自由和枷锁之间进行方向选择时,那种只

为精英阶层发展服务的现代化逐渐消逝了。与此同时,普通人即人民民主的现代化进程却起步了:不仅是在美丽的莱茵河畔,而且也在中国,勇敢并且是永不停顿地起步了。

布瑞克《1525 年革命》的翻译工作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朱孝远主持的。此外,先后参与翻译的有陈海珠、钱金飞、杨晋、余浚、何正清、许伟中、霍训根、左方等人。全书最后由钱金飞进行了统稿和校审,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最后,由朱孝远阅读了全稿,并最后校阅了一遍。用集体的力量翻译德国史上的经典著作还是初步尝试。译文方面有不妥当的地方,还希望读者和专家们多提意见。

引言:各种解释、存在问题和全新的概念

1848年革命前夕以及革命进行期间,学术界乃至一般民众才开始注意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因此人们是在一种紧张的政治氛围中来看待这场战争的,而这一政治紧张是由德国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引发的。列奥波德·冯·兰克誉之为“日耳曼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自发事件”^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誉其为“德意志人民最壮观的革命之举”^②。而对于德国的第一个现代历史学家——威尔海姆·戚美尔曼来说,这场农民战争不啻是“一场自由对非人道压迫、光明对黑暗的战斗”^③。上述引言均表明了农民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这一意义迄今仍为联邦德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界所认同。例如,斯特凡·斯卡尔魏特说农民战争“就像一场自然的灾害

① 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第2版,第165页。

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德国农民战争》(*Der deutsche Bauernkrieg*),第409页。

③ 威尔海姆·戚美尔曼(Wilhelm Zimmerman):《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ssen Bauernkrieges*),第1版,第5页前后。

一样,仍然被掩盖在一种无法解释的迷雾之中”^①。而在马克斯·施泰因梅茨眼中,它则是“1918年11月革命以前德国人民最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②

兰克、恩格斯、戚美尔曼——这些名字已成了对农民战争看法各异的象征。1848年对农民战争所作出的最初学术性研究经常遭到曲解,有时甚至陷入政治事件的泥潭。在反击维腾堡(Württemberg)国王威廉(Wilhelm)武力驱散于斯图加特(Stuttgart)召开的法兰克福议会会议之后,觉醒的民众们不再容忍这样的观点:农民战争是一场革命。那些一直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威尔海姆·戚美尔曼的信仰而宣扬的根本的东西,现在已经声名扫地了。一旦国家和社会问题“自上而下地得到解决”,恩格斯根据阶级冲突和民族国家兴起的原则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努力也几乎引不起更进一步的注意了。取而代之的是,史学界开始转向兰克所开辟的研究道路。兰克把农民战争打上了“自发事件”(natural event)的标签,因为在他的《宗教改革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一书内所考察的当时政治和宗教之网中,他不能为农民战争找到合适的历史位置。他相信起义的发生是因“对农民日益残酷的压迫”而爆发的,但那只是1525年前几年的情形;他还认为农民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反宗教改革倾向所作出的反应(a reaction to Counter-reformation tendencies),在某种程度上是背叛路德的牧师们所举之事。兰克把农民战争变成了一个背离了宗教改革史这条主线的问题(a topic peripheral to the main lines of Reformation history),并力图避免让学者们认为,是宗教之外的因素激发了农民战争。

在19世纪下半期,对农民战争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止,我们把这种研究的不停顿归因于急速开辟的地区史研究领域。不过所作的研究大部分是描述性的,多限于事实的累积和史料的出版。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

① 斯特凡·斯卡尔魏特(Stephan Skalweit):《帝国和宗教改革》(*Reich und Reformation*),第179页。

② 马克斯·施泰因梅茨(Max Steinmetz):《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Die frühbürgerliche Revolution*),第43页。